



云南文史书系



# 吐蕃史论从

何耀华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吐蕃史论丛

何耀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吐蕃史论丛 / 何耀华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10

(云南文史书系)

ISBN 978-7-108-05118-9

I. ①吐… II. ①何… III. ①吐蕃—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8331 号

选题策划 朱利国 曹永平

责任编辑 胡群英

装帧设计 薛宇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 数 148 千字

定 价 70.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目录

前 言 1

从远古文化遗存看吐蕃先民与祖国内地居民的关系 5

古代羌人与青藏和川西土著居民的融合 39

早期吐蕃史事考 89

论松赞干布的统一事业 121

论文成公主入藏 143

论金城公主入藏 171

西北吐蕃诸部与五代、宋朝的历史关系 205

康巴、“东蛮”与宋朝的历史关系 247

附文：川西南藏族史初探 277

学术年表 315

## 前 言

1980年10月，我去拉萨向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多杰才旦同志汇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筹建情况。多杰主席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决定以著名藏学家后来出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的平措次仁同志，作为西藏的代表参加筹备组。在多杰主席和平措同志的关怀帮助下，我参观了拉萨三大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访问了堆龙德庆县的藏村，去藏民家做客。这次参观访问使我深受教育，深被激励。看到西藏的伟大文明和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我的感受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

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昆明成立后，首先作出了一项决定，就是要把对藏族的研究作为学会工作的重点。1983年，研究学会去拉萨召开全国首次藏族研

究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对此欣喜万分。可是，那个时候大批学者要去拉萨，不能不说是困难重重，如进藏的交通、高海拔的适应、对研究藏族的学术基础的构建等等，但去西藏接受藏文化的洗礼，毕竟是大家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任何困难都是无法阻挡的。百人规模的全国首次藏族研究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7月在拉萨如期召开，我为多杰才旦主席起草的《为建立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藏学而奋斗》的开幕词，获多杰主席的肯定，他说：“写得很好，主题思想不错，文字也精练，但我要增加一个字。”他拿起笔，在“藏学”的前面加了个“西”字。这个“西”字令我回味无穷，真是一字值千金呵！作为西藏自治区政府的主席，他期望用这个字，使未来的藏学聚焦在研究西藏的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问题上，使藏学直接服务于西藏、直接贴近藏族人民。其次，作为一个藏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把藏学称为西藏学，不仅从空间上反映了藏学发展的实际，而且对藏学的学科建设和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这不是说，藏学可以不对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进行研究。

全国首次藏学讨论会之后，我增加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藏学也作为锐意耕耘的科目，并从零开始踏上征程。一方面，我对大量的汉、藏文历史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另一方面，又对藏族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三次进藏，两次到川西藏区，多次到云南迪庆藏区，一次到青海藏区，直接收集鲜活在藏族民间的历史文化资料，并了解藏族对发展藏学的需求。与此同时，应日本藏学家长野泰彦及东洋文库库长北村甫的邀请，我去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和东洋文库进行了半年的藏学研究，吸收左藤长、山口瑞凤关于吐蕃史研究的成果。

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在云南大学招收了三届共五名藏学博士研究生，以教学相长的方式，对藏学，特别是云南藏族进行研究。这期间，我在《中国藏学》、《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动态》、台湾《大地》杂志等刊物，发表了《从远古文化遗存看藏区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试论古代羌人的地理分布》、《古代羌人与藏区土著居民的融合》、《早期吐蕃史事考》、《川西南藏族史初探》、《论松赞干布的统一事业》、《论文成公主入藏》、《论金城公主入藏》、《西

北吐蕃诸部与五代、宋朝的关系》、《康巴、“东蛮”与宋朝的关系》、《多须人的起源及其他》、《川西南藏族的民间信仰》、《雅砻江下游的纳木依人和拍木依人》、《香格里拉藏族的环保观》、《中甸藏区考察记》（1991年3月5日出版的台湾《大地》杂志第36期，发表此文时，将题目改为《边区藏民甜蜜的家——中甸》）等15篇论文。其中，有4篇是研究六世纪以前吐蕃先民的，有10篇是研究七至十世纪吐蕃王国和周边吐蕃属部的，现从其中选择8篇，汇编成这个集子。另《川西南藏族史初探》在内容上与前几篇虽有重复之处，但论述角度不同，仍具参考意义，故以附文形式录之于后。本次汇编除对两篇作过少数的修改或作局部的调整之外，均保留了上世纪发表时的原貌。作为一家之言，希望能为未来藏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2013年6月10日于昆明



## 从远古文化遗存看吐蕃先民与祖国内地居民的关系

“吐蕃”是公元七至九世纪建于中国青藏高原的古代藏族王国的名称，但也用于称呼藏族的古代先民和与它毗邻的吐蕃部落。考古学的资料证明：从远古时代开始，藏族先民，就劳动、生息、繁衍在今青藏和川西高原地带，并与祖国内地各民族的先民，结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研究藏区的古文化遗存，对于认识这个整体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青藏高原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发祥地

青藏高原是藏族的主要分布地，平均海拔四千多米，有“世界屋脊”或“世界第三极”之称。这里适不

适宜于远古人类居住，是不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一直是科学家们着力探索的问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首先是考古资料。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考古学界不但在青海藏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在川边藏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且还在西藏的定日、黑河、申扎、双湖、阿里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在聂拉木、申扎、双湖发现中石器时代遗存，在林芝、墨脱、昌都、拉萨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物。这些发现说明：青藏高原曾是猿人、古人、新人的乐园，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发祥地，是孕育我国各民族先民的摇篮之一。

其次是民间传说资料。藏族人民传说，在遥远的古代，喜马拉雅山地区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海风卷起波浪，搏击着长满松柏、铁杉和棕榈的海岸，发出哗哗的响声。岸边长满奇花异草，斑鹿、羚羊、犀牛、野象、兔子、杜鹃、画眉、百灵鸟……应有尽有。一天，海里突然出现一条巨大的五头毒龙，掀起万丈的海浪，摧毁了花草树木，所有飞禽走兽遭到了灾难性的袭击。正当它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大海的上空突然飘来五朵彩云，

变成五部慧空行母，降服了五头毒龙，而后大地风平浪静，到处充满生机。飞禽走兽们求仙女们留在凡间为众生谋利，于是五仙女喝令大海退去，东边变成茂密的森林，西边变成万顷良田，南边是花草茂盛的花园，北边是无边无际的牧场。五位仙女，变成今天喜马拉雅山祥寿、翠颜、贞慧、冠咏、施仁等五座仙女峰，屹立在西南部边缘上，守卫着这幸福的乐园。那为首的翠颜仙女峰便是珠穆朗玛峰。<sup>[1]</sup>这个传说当然不可尽信，但也不能认为它毫无参考价值。拨开神话色彩的外衣，可发现它具有反映历史真实的某些客观性。如它在叙述松柏、铁杉、棕榈及众多飞禽走兽在大海岸边出现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有人类共生，而在大海退去之后，才出现了与人类有关的良田、牧场。这是符合生物发展规律的。地质学资料认为，裸子植物——松柏、银杏等出现于古生代二叠纪，繁盛于中生代侏罗纪；哺乳类动物出现于中生代三叠纪，鸟类出现于中生代侏罗纪，至新生代第三纪，植物、动物逐渐接近于现代，而人类出现于其后的新生代第四

---

[1] 赤烈曲扎：《西藏风土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纪。<sup>[1]</sup>因此，这个传说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青藏高原曾是人类发祥地这个历史真实的。可以这样说，传说中提到的人类乐园，就是我们所说的孕育人类的摇篮。青藏高原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就是在这个摇篮中发展起来的人们的创造。

第三是地质资料。我国科学工作者多年进行的综合科学考察证明，在几十亿年前的元古代，青藏高原确实是一片浩瀚的海洋。从在昌都达玛拉山两侧挖掘到的蜥蜴类等第三类恐龙化石，在喜马拉雅山北坡吉隆县、聂拉木县和念青唐古拉山区比如县发现的三趾马化石以及丰富的白垩系、第三系海相、陆相植物化石来看，在距今一亿六千万年到一亿四千万年的侏罗纪早期和中期，它的东部昌都一带还处于浅海低陆的湿热环境，到上新

---

[1] 地质学家将地球的发展分为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等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代下为纪，如元古代下有震旦纪，古生代下有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留纪、石炭纪、二叠纪，中生代下有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新生代下有第三纪、第四纪。纪下有世，如第三纪有古新世（距今七千万年）、始新世（距今六千万年）、渐新世（距今四千万年）、中新世（距今二千五百万年）、上新世（距今一千二百万年），第四纪下有更新世（距今三百万年）、全新世（距今一万年）。人类出现在第四纪。旧石器时代以人类出现作为标志，也开始于新生代第四纪。

世之前二百五十万年，青藏地区才逐渐上升为陆地，但地势并不高，自然景观接近于亚热带类型。现今青藏高原的地理特征，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形成的。这就是说，在青藏高原形成的过程中，曾有过适宜古人类生息、繁衍的极为优良的自然环境，曾有过孕育人类和产生古代文明的重要时代。

第四是古代人类学资料。迄今为止，古人类学界尚未在青藏和川西高原地区发现可能演变为人类的古猿化石及古人类化石，但是，在它的毗连或邻近地区却有足以说明问题的此类发现。在我国云南省的开远小龙潭和禄丰县境内，在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印度北部的西瓦立克山区，都有“拉玛猿”（*Ramapithecus*）化石的发现，这种古猿被公认是最接近人类的古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其大约生存于一千五百万年至一千万年以前，形似黑猩猩，面部短促，下颚拱出，牙有某些人齿的特点，能下地行走，主要活动于亚洲南部和非洲东部。大致属于亚洲南部的西藏高原，有这种古猿生存当是不成问题的。应该指出，拉玛猿还不是人，因为它们还不会制造工具。会不会劳动是猿与人的分界线，而猿演变成人类，

就是“从制造生产工具开始的”<sup>[1]</sup>。古猿发展为会制造及使用工具的人，在体质特征上经历了猿人、古人和新人三个不同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人类化石，在我国青藏高原邻近地区都有出土。如1965年5月，在云南元谋发现两枚猿人的牙齿化石，形态和北京猿人的同类遗骸近似，都属于直立猿人的类型，故被定名为“直立猿人元谋亚种”，简称“元谋人”<sup>[2]</sup>，其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泄湖镇陈家窝村及其附近公王岭的红色土中，出土猿人的下颌骨、头盖骨、面骨及牙齿化石，体质形态与元谋人一样，都比北京猿人更为原始，其生存年代大约为距今五十万至六十万年前，被定名为“蓝田中国猿人”，简称“蓝田人”<sup>[3]</sup>。古人的化石于1922年出土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乌审旗滴哨沟，被定名为“河套人”<sup>[4]</sup>。新人的化石发现

---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142页。

[2] 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猿人牙齿化石》，载《地质学报》，1973年第11卷第1期；张兴永、周国兴：《元谋人及其文化》，载《文物》，1978年第10期。

[3] 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下颌骨化石》，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8卷第1期；吴新智、袁振新：《陕西蓝田公王岭猿人地点1965年发掘报告》，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第10卷第1期。

[4] 贾兰坡：《河套人》，龙门联合书店1951年版；吴汝康：《河套人类顶骨化石和股骨化石》，载《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卷第4期。

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的山顶洞及四川资阳等地，被称为“山顶洞人”及“资阳人”，其体质形态已没有“猿”的特征，同现代人无显著区别，其生存年代大约距今一万八千年。<sup>[1]</sup> 这些人类化石的出土地，从宏观上看，都属青藏高原的毗连地区，从微观上说，都距青藏高原较远，我国学术界历来认为，黄河流域及华南地区，是这些人类的发祥地。西藏境内发现的大量旧石器时代、细石器（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是猿人、古人及新人留下的遗物，如果只承认黄河流域及华南地区是我国各族祖先的发祥地，那么，在西藏等藏区发现的文化遗存，只能是从祖国内地迁去的人留下的，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它不能排除青藏高原本身就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发祥地，那里的文化遗存是当地孕育的人类遗物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青藏高原孕育的人类迁到祖国内地，并在华北、华南等地留下文化遗存的可能性。因此，青藏高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发祥地的结论，是能够成立的。

---

[1] 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店 1951 年版；裴文中等：《资阳人》，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 二、青藏地区吐蕃先民的远古文化

### (一) 黑河、霍霍西里、申扎、双湖等地的旧石器

1956年七八月，我国地质学家在西藏的黑河，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霍霍西里、托托河沿及格尔木等地，发现了十数件打击石器。石器大多分布在河谷两岸阶地的非原生层位的地表上。未见有磨光石器及陶片等遗物。

石器地点的海拔除格尔木的三岔口为 3500 米以外，其他三处(黑河、霍霍西里、托托河沿)都在 4300 米以上。在黑河采到石器两件，其中一件似有人工痕迹，另一件是长方形的石髓石核，长度为 15 毫米，发现于黑河西约两公里的山谷河岸上。在托托河沿采到石器两件，其中一件为黄色石髓制成的半圆形刮削器，长度为 25 毫米，由单面修琢而成，发现地点在托托河沿(乌兰木伦)之北约十公里的红色砂岩河岸上。在霍霍西里采到石器五件，皆有打制痕迹，多半是用河光石制成。其中砾石工具四件，大多仅在砾石之一端进行加工，其余部分不加修整，内有一件可能是石核，除去一大部分保留自然



面外，其余部分都有打击的痕迹。另一件为石片工具，一面保留有自然磨蚀面，但四周都有打制修整的痕迹，边沿呈弯曲形，发现地点在距霍霍西里南约二十公里的曲水河河岸上。三岔口石器为石英岩石器，其一端有加工的痕迹，刃边呈锯齿形，发现地点距格尔木西南约九十八公里。<sup>[1]</sup>

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高原申扎境内的珠洛勒、卢令和双湖境内的玛尼、绥绍拉等五处地点，采集到石片石器十四件。特点是石片厚大，质料全部为角岩，多由狭长的石片或宽大于长的石片所制成，不少石片上还保留着局部的砾石面，台面事先经过修整，是在石核上用直接打法制成。石器的修整比较细致，一般都从劈裂面向背面沿着边缘锤击加工，但在局部需要的地方也采取交互修整的方法。对于形状适当或局部锋刃合乎要求的石片，则往往不经加工而直接拿来使用。石器按器形可分为长刮器（六件）、圆头刮器（五件）、双边刮器（一件）和尖状器（两件）

---

[1] 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载《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卷第2、3合期。